

李兆良

著

Decoding Kunyu Wanguo Quantu:
Ming China and the World

明代中国与世界

坤輿萬國全圖 解密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明代中国与世界

坤輿萬國全圖 解密

李兆良 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内容提要

本书通过对明朝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《坤舆万国全图》详加研究,通过比较 14 世纪至 19 世纪间六百多份地图,并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,分析地名、语源、地形、按语,解答东西海上交往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,如郑和下西洋的终点、明代中国人是否到过美洲、谁最先发现了美洲,等等。本书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揭示历史真相,用刑侦推理方法去侦破历史悬案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坤舆万国全图解密 / 李兆良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313-16403-2

I. ①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历史地图—研究—世界—古代 IV. ①K9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9754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坤舆万国全图解密》。

坤舆万国全图解密: 明代中国与世界

著 者: 李兆良

出版发行: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200030

出 版 人: 郑益慧

印 制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960mm 1/16

字 数: 227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313-16403-2 / K

定 价: 49.80 元

地 址: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

电 话: 021-64071208

印 张: 20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联系电话: 0539-2925628

追寻真相是一种煎熬，

真相本身可能是更大的煎熬。

真正寻求真相的人不会因为苦而放弃。

人人都想真理在他的一方，

但不是每个人都想站在真理的一方。

有真相才有真理。

谨以此书献给追寻真相，热爱真理，不怕苦，

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们。

推荐序

跨过一步，将石破天惊 ——写在李兆良《坤舆万国全图解密》简体 版出版前

毛佩琦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

不论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还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，都有很多节点。在漫长的、平庸的、令人烦闷的过程中，偶然的、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事物的出现，打乱了一切，改变了一切。传统的、毋庸置疑的结论被颠覆了，人们的认识豁然改变，社会大踏步地向前。

关于谁最先发现了美洲，这个古老的话题，现在大概就处于令人烦闷的、看不见头绪的过程之中。人们在不经意中将有一个事物出现，会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节点吗？其实，一切都在静静地发展，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着。所有爆发都因为长久的能量积蓄，所有节点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而推动这一切的，是那些默默耕耘的人，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，是努力进取坚持不懈的人。

但是，在往前走的路上也有些意外的插曲。

关于谁最先到达美洲，近百年来众说纷纭，各有主张，从先秦至明代，迄无结果，而主旨说是中国人早于哥伦布到了美洲。有意思的是，总体上学术界不大参与这一讨论，而“民科”则乐此不疲。就好像严肃的科

学家，很少有人介入 UFO（不明飞行物）的讨论一样。

几年前，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·孟席斯出版《1421：中国发现世界》，他提出中国明代郑和航海曾经到达美洲。此论一出，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引起轩然大波。此书竟在 135 个国家出版了 24 个版本。但是，因为孟席斯引用的论据经不起推敲，也引起中外学者对他严厉的批评，甚至是毫不客气的嘲讽。期间，恰好也有一位中国律师，以一幅来路不明的“古地图”也来论证中国人最先到达了美洲。同样因为他所出示的那幅地图明显造假，而失去了讨论的基础。如此景象竟至闹得一些学者纷纷远离这一话题，唯恐避之不及。

实际上，中国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持积极开放态度的，对孟席斯等人的意见也给予了认真倾听。孟席斯来华，在一些地方发表演讲引起如此轰动，学界当然不能对此冷漠而不闻不问，必须予以正面应对和回答。当时，我商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女士，邀请孟席斯先生，在社科院考古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，倾听他的意见。后来《1421：中国发现世界》中文版出版，我又帮助他组织新书发布会。发布会以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和海洋出版社的名义举办，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楼逸夫会议中心报告厅举行，并且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席，以示隆重。我们想以此表明，我们的学术界并不是闭目塞听，拒绝新鲜意见；我们的学术界，也不是高筑门槛，拒绝他人进入。我在会上致辞，表达对孟席斯先生的敬意，对他能一反西方中心论而重新审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表示欢迎。同时，因为他曾在海军服役、有多年航海的经历，也期待他在研究上带来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。但是我也直言，尽管你对中国古代航海家说了不少好话，因为你提供的证据不足，或是有缺陷的，我们不能同意你的结论。我们虽然没有支持孟席斯的论述，但却也符合李兆

良教授倡导的——“对新事物、新学说，尤其是与一贯理论相悖的，是否能虚心聆听、观察，提供机会做良性讨论是重要的学者态度，立论者是什么人，什么背景，应该与理论完全脱开”——的原则（前言，第5页）。

近年来，李兆良教授因研究郑和航海而知名。我和他在有关郑和的研讨会上几次相识，已经多年了。我知道他最近着力研究古地图的问题，也大体知道他的论点，但只是断断续续看到他的一些文章，一直没有全面拜读他的大作。作为曾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兆良教授，会重复孟席斯吗？去年，当我读了他通过各国语言分析古地图命名的等等论述后，我坚信李教授是一位博学严肃的学者，正在努力推进研究。现在，在我面前摆着李兆良教授的两部书稿，《坤舆万国全图解密：明代中国与世界》和《宣德金牌启示录：明代开拓美洲》就是他积年钻研所得，细读下来，感到它们分量很重，确实是言而有据且严肃的学术著作。长期以来，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传统认识会将因此而被改写吗？

作者面对的课题是严肃的，他在本书的前言中直言：

这本书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：

- （1）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；
- （2）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；
- （3）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。

郑和下西洋，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。明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到宣德八年（1433年）郑和担任国家正使七次出使西洋，200余艘船、27000余人，持续20余年，纵横印度洋，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。惜乎郑和的船队止于东非，未曾绕过好望角，未能涉足大西洋，更未曾穿越太平洋，而把“发现”美洲这件事留给了70年后的哥伦布。

意大利人哥伦布，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，从1492年到1502年四次

横渡大西洋，成功到达美洲，被誉为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，因此而影响了后来 400 年的世界历史进程。

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，在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，他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知识，还因为与中国学者李之藻共同绘制了《坤舆万国全图》，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地理的概念，中国人因此得以知道世界有五大洲。作为标志性的物证，这幅地图现在还完好地收藏于中国南京博物院。

以上这些“史实”明确地记载在中外历史著作中，凿凿切切，确定无疑，几乎不容有人提出异议。挑战世界史的三大经典学说，这事实太重大了，李兆良教授当然知道这件事的分量。

他预见到探索真理的路并不平坦：

有人说郑和是六百年前的事了……哥伦布已经是五百年前的事了，谈它有什么意义？一定会招来一顿白眼和激烈的反驳，说不准还会有肢体碰撞（前言，第 5 页）。

“想当然”相信西方经典这惯性太大了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简直是忌讳，没人敢触动。西方历史学家未必故意自大。他们可能也是按照认识的局限而把发现美洲新大陆引以为自豪。墨卡托把加利福尼亚放在北极，奥特里乌斯的南北海乱套，艾儒略的东西洋不辨，还一直被认为是把近代地理学介绍给中国的恩师。又有多少西方学者懂中国文字、历史，去特别考证《坤舆万国全图》的来源（总论篇，第 67 页）？

西方根据这种“局限的认识”而“引以自豪”，傲视东方而且以此作

为文化优越的证据。进入近代以来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入侵中国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后来又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，把中国人的自信心全部摧毁了。在西方侵略的压迫下，民族感情遭到伤害，正常的思维被扭曲，中国人匍匐在西方面前，宁愿不加分辨地接受这种“局限的知识”，甚至以这种“局限的认识”自轻自贱而不自觉。西方神话不可动摇，所谓西学东渐，只能是西方给中国带来先进文化，利玛窦成了传播圣火的使者，只能是他绘制了《坤輿万国全图》，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

李兆良教授说：

西学东来其实只是事实的一面，却是动摇中国自信的主要原因。四百年以来，有些国人以为中国文明处处不如西方，妄自菲薄，是崇洋媚外，自卑积弱的根源。直到今天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利玛窦西学东渐的论点还是一直被重复。好好利用新工具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价值，继续发扬学术科学精神，是当今要务（总论篇，第 68 页）。

以此，李兆良先生把这项研究不仅仅看做是复原历史真相，也看做是伸张历史正义。作为学者，李兆良教授把追求真相、追求真理视为天职，视为科学工作者的担当：

当新信息与传统观念冲突时，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，是固守成见，还是追求真相？这是分辨科学工作者的标准。两种观念矛盾牵涉到国家民族的荣誉，是接受真相，还是维护自己的权益？这是世界公民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分野（前言，第 1 页）。

为此，他不惜付出艰苦努力，不畏遭遇冷眼和责难。他甚至引历史上那些为追求真理而不惜以身殉道的先贤为榜样：

哥白尼、伽利略、达尔文……在最困顿的时候，坚持信念，这信念使人类迈向了了解宇宙的自由，把真相告诉同类，让这种共识给予人类更大的思想空间，更多的自由。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，有了真相，才有真理（前言，第6页）。

真相来自科学根据的公开讨论，让新的正确的数据纠正旧的错误。不能做到这点，就是不忠于科学精神。不能如实反映历史，作出的结论也无从使人吸取经验教训（前言，第6页）。

历史是带着后视镜的车头灯，以古为鉴，照明人类的将来。历史这面镜子有时被某些利益扭曲成了哈哈镜，不能反映真实，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实。人为的篡改、无意的歪曲、湮久的朦胧、散佚的断层，逐步在现代科技的镜头下重新聚焦，使人初则怀疑，继而恍悟、惊愕、惋惜、感慨，也有庆幸大白的欣喜（前言，第7页）。

最重要的意义，我觉得是认清科学验证历史资料的重要性，揭示历史真相，从中找到一些教训，作为将来发展的指向（前言，第5页）。

学术研究应该是冷静的、理性的、实事求是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学术研究与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无关。人都是有立场的，有感情的。但个人的立场、感情不可以对研究进行任何干扰，或者说，研究者应该排除个人的

立场、感情对研究的任何干扰。研究者不能预设结果来引导自己的研究，不允许基于自己的立场、感情，对材料进行取舍。即使最终得到的事实结论与自己的立场、感情完全相反，研究者也必须义无反顾地予以接受。这样，才能复原历史的真实。凭借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，这样的结论才有资格指导社会实践而不至迷失方向。

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的艰难程度。破解历史难题，犹如侦破迷离的刑事案件。古代学人把历史考据比喻成老吏断狱，必得是坚不可摧的铁证，才可以下论断，才可以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判决。考据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因为是谜，才需要破解；因为是覆，才需要揭开。作者的确也从刑侦方法得到了启示，如：

不只是谈历史地理，也不是为了郑和翻案而写，是尝试用现代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去揭示历史真相，用刑侦推理方法去追寻新的证据，侦破一宗六百年的历史悬案，在过程中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误区与将来的路向（前言，第1页）。

在论述中，他使用了实证的比较排除法。他一再引用神探福尔摩斯的话——当然是柯南·道尔总结出来的话：

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，剩下的无论概率怎么低也是真相（总论篇，第3页）。

他的研究是从追究一幅地图的真相开始。一般认为，1602年利玛窦《坤舆万国全图》是根据1570年《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》绘制的。但是李

兆良教授发现,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上“居然有一半的地名,包括美洲的地名,没有在《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》中出现,有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欧洲绘制的地图和文献。”(前言,第8页)而利玛窦自承此图之绘“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,重为考定。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,兼增国名数百”(总论篇,第14页)。那么,应该是利玛窦绘此图之前,中国本来就有一些地图,这些图和中国“通志诸书”记载的许多地名是利玛窦原来不知道的,或记载错误的。利玛窦用中国地图和通志诸书补充、纠正了他带来的西方地图。因此,李兆良教授断定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更多更早:

事实上,西方坦白表明地理大发现的文献与地图配不起来,地图上出现的地理与地名没有其他文献支持……没有“发现”记录的地图只能是抄自别人的地图,一定有人更早发现了这地理(总论篇,第67页)。

他还发现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中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:

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不标示天主教教宗领地,与利玛窦作为欧洲耶稣会会士的身份不符,时代不符;

欧洲发现者命名的美洲城市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地名没有出现在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上,于理不合;

其他同时代欧绘地图上地名地域拼写不统一,混淆东西南北,唯独《坤輿万国全图》正确无误;

根据发音,《坤輿万国全图》有些地名原文不是欧洲文字,是中文翻译成欧洲文字(前言,第2页)。

如此等等。他得出结论说：

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主要是郑和时代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，是中国文献。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，明代中国人测绘的第一份世界地图（前言，第3页）。

利玛窦实际上把中国所知的世界地理原材料介绍给西方（前言，第3页）。

这一结论来之不易。本课题十分复杂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完成的，“涉猎到欧洲、中国、美洲、伊斯兰，甚至非洲历史。牵涉的领域包括金属学、旗帜学、陶瓷、动植物、农业、风俗、语言、人种学、地图等”（前言，第6页）。李兆良先生如是说。据作者自述，“本书引用的西洋文献包括葡萄牙文、西班牙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荷兰文、拉丁文等多种外语人名地名”，还有中国的地方语言粤语、客家语等等（前言，第9页）。至于地图，则是本书论证的主体，作者几乎穷尽了中外图书馆、博物馆收藏的各种文字、各种版本的地图。李兆良教授说：“追寻真相是一种煎熬，真相本身可能是更大的煎熬。真正寻求真相的人不会因为苦而放弃。”（本书卷首题词）

李兆良先生通过扎实的证据，对谁最先发现美洲，对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作者的传统说法做出了断然否定。我认为，他的论述是言之成理的，至少是动摇了这些经典理论的根基。传统的论述，无法回答李教授的问题。按照前述引用的推理原则：“排除了不可能，其余就是可能的。”

但是，我也认为，李兆良教授的结论还有进一步完满的必要。比如，郑和的船队，至少其中一部分，曾经到达了美洲，李兆良教授推断说“宣德时代的第七次郑和下西洋，可能是其中一支船队遇到风暴，流落到美

洲”（前言，第7页）——这是完全可能的，但亲历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郑和航海的费信、马欢，在他们的航海实录《星槎胜览》《瀛涯盛览》中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？如果说，官府收藏的郑和航海资料已经销毁，而费信、马欢的著作倒是完整留下来了，还有宣德六年（1431年）的“天妃灵应记碑”。另外，郑和时代以后，明代涉及“四夷”的典籍不少，比如《东西洋考》、《咸宾录》、《皇明四夷考》、《殊域周咨录》等等，也没有出现在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中标注的任何美洲地名，这怎样解释？另外，到达美洲的中国人都同属于郑和船队吗？还有没有别的人？李兆良教授说，《坤輿万国全图》的资料来自于郑和时代的航海者，他们也必然属于郑和船队吗？郑和航海结束以后到隆庆开海前，民间航海通番是被禁止的，但是存在大量违禁出洋的情况。嘉庆、隆庆、万历活跃的海外贸易，包括以平倭寇的名义进行的出洋，有没有可能到达美洲？这些出洋被官方视为禁忌，记录这些出洋也当然成为禁忌，迄今我们很难看到这些民间出海的记录，而这些都发生在利玛窦、李之藻绘制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之前，都可能为他们绘制地图提供资料。还有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利玛窦绘制《坤輿万国全图》之前，尽管中国人通过航海获得了许多欧洲人不掌握的资料，或许并没有拼凑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，利玛窦结合他的地理知识在李之藻的配合下完成了《坤輿万国全图》的绘制。这其中，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细节吗？

我知道，李兆良教授还续有《宣德金牌启示录》等等一系列大作进一步回答学界和读者关心的问题。学无止境，真相越辩辨越明。诚如李先生所说，有了真相，才有真理。真理使我们获得自由。郑和航海、发现美洲这样的大问题，跨过一步就将石破天惊。对世界三大经典学说的改写，不仅仅是要改变一两个历史事件的记录，实际上改写的是数百年世界历史的

叙述格局，改变以西方为中心主导的历史话语体系。这件事意义之重大，比物理学上广义相对论迈进到狭义相对论还要大，直可比于日心说取代地心说。如是，将如同拨云见日，让我们获得真理，获得更大的自由。

我敬佩李兆良先生的研究，愿意为《坤舆万国全图解密》简体版的出版做上述赘言。

2016年12月14日
于泰西之帕多瓦旅寓

推荐序

改写世界近代史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 ——从中国古地图挖掘历史真相

廖克

中国地理学会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

国际地图学协会国家与区域地图集委员会委员

地图是人类表达空间信息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，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。无论中国，还是东、西方其他文明古国，都产生了悠久而且自成体系的地图文化。历史时期绘制的古地图和近代地图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信息，呈现出历史时期各国的疆域范围、山川走势、聚落分布、城市布局、海陆交通、行政区划等时空地理信息，反映国家和世界文明的变迁，体现各国不同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。所以世界各国学者都非常重视地图史和地图学史的研究。

地图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活动的实际需要。在东方古老的国家，如中国、埃及、巴比伦等，由于农业的发展，需要丈量土地和兴建水利工程，产生简易测量工具和方法。例如在古埃及尼罗河沿岸开始有农业时，春季的河水泛滥淹没了农田，冲毁了田块边界。为重新确定土地，便产生了具有数学意义的、用图形表示土地轮廓和数量的地图。同时行政管理、通商贸易及邻国间的战争，都促进了地图制图的发展。那时的地图大都绘在粘土板、陶片和石壁等上面，很少保存下来。迄今发现不多，已发现的最早

一幅地图，是在古巴比伦北部加苏古巴城（今伊拉克境内）发掘出刻在陶片上的地图，图上绘有古巴比伦城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周围的山脉，大约是公元前 2500 年刻制，至今 4500 多年。

中国有记载的最古老的地图要算 4000 年前夏禹的《九鼎图》了。九鼎是当时统治权力的象征。在鼎上除了铸有各种图画外，还有表示山川的原始地图，后来派生了《山海经图》。在《山海经图》中，也有绘着山、水、动植物及矿物的原始地图。10 多年前在河南安阳出土的《田猎图》，在甲骨上刻有打猎路线、山川和沼泽。在云南沧浪县还发现了巨幅崖画《村圩图》，都是 3500 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原始地图。之前还出土了刻在铜版上的《兆域图》（公元前 310 年）和 7 幅绘在木板上的《放马滩地图》（公元前 239 年）。

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彩色地图，即地形图、驻军图和城邑图，均绘在帛上，约为公元前 168 年以前的作品。地图方向为上南下北，呈边长为 96 厘米的正方形。地形图的范围包括东经 111 度至 112 度 30 分、北纬 23 度至 26 度之间，即跨湖南、广东两省及广西一部分地区，湘江支流潇水流域、南岭、九嶷山及其附近，当时为长沙国的南部。该图比例尺为 1:18 万（相当于一寸折十里）。地图上表示了河流、山脉及山峰、居民地、道路、海洋等内容。同现今地形图比较，其平面图形、河流流向和弯曲都大体相似。居民地用矩形符号和圈形符号分别表示县级和乡里级，位置相当准确，重要居民地之间都有道路相连。地形图具有分级明确的符号系统。同样驻军图和城邑图内容也都相当丰富并各具特色。这显示距今 2200 年的西汉初期，从测绘的准确性和地图的绘制与整饰水平来看，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且水平最高的地图，充分表明当时中国地图制图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。其中地形图已成为现代国际上权威地